

朱熹的历史世界

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

余英时 著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Copyright © 2011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著作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余英时著。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7

ISBN 978-7-108-03700-8

I. ①朱… II. ①余… III. ①朱熹(1130-1200) - 思想评论 ②士 - 研究 - 中国 - 南宋 ③大夫 - 研究 - 中国 - 南宋
IV. ①B244.75②D691.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59171号

责任编辑 孙晓林 舒炜

装帧设计 蔡立国

责任印制 张雅丽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京海印刷厂

装 订 北京博丰伟业装订有限公司

版 次 2011年7月北京第1版
2011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张 29.5

字 数 706千字

印 数 0,001-5,000册

定 价 78.00元

朱文公自画像

朱文公自画像
子瞻字子瞻，眉州眉山人也。少负异才，文章冠世。嘉祐初，召试制举，入第四等，授沔州教授。未几，召试馆职，入第三等，授直龙图阁、知制誥、权知礼部贡举。初，文公以文章见知，旋以文章致谤。自是求退，乃以直学士知杭州，未几，召还，以龙图阁直学士知开封府，未几，召还，以翰林学士知制誥兼权御史中丞。初，文公以文章见知，旋以文章致谤。自是求退，乃以直学士知杭州，未几，召还，以龙图阁直学士知开封府，未几，召还，以翰林学士知制誥兼权御史中丞。初，文公以文章见知，旋以文章致谤。自是求退，乃以直学士知杭州，未几，召还，以龙图阁直学士知开封府，未几，召还，以翰林学士知制誥兼权御史中丞。



朱文公自画像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論道之餘賜以

一言得得乎從所從實不能妄望於

門下泉功主拜手不勝祈祝之切伏乞

鈞照

者謹具

呈

曾社即權信通南陽等處各處中幼學朱熹



立昨日二通回之日人

稟劉到聲偶有貧弱民不從教者不免要

卷中

者聞其人茲獨者未伏想

庶相於里社間之日甚其為人特想

數委重行行完于若去年甚！即今志三衛前認別得具

卷中

者謹具

呈

三月十一日宣統元年閏三月十五日清里學堂全通書局印

朱熹 上時宰二札子
故宮博物院藏

主之前者便中里來

翰翰立賜去月未間拜治略叙

謝誠寤計之遊

登徵健此未遑嗣問下情但切瞻仰 主前所具

稟誠祝清初二事伏想之蒙

鈞念矣但近預計日以俟

賜可之報而香蒸其有聞兼病之軀日亟疲憊舊滯之

外加以洞泄不時並旬未止兩月昏眩殆不復見物如作此

字但以其換索寫成其大小濃淡略不能知又以翰性狹

者不能自寬博書期會之間不敢全然曠弛日夕應

接吏民有閱文章者更旬月不得脫立即精神氣血內外

枯耗不復可更支吾矣至於郡計宜益者矣料理極上

暇以為憂也今有劉日中一懇乞賜

據會

二公之間不敢教致私書亦以若具稟蜀託劉克去回云

家轉閱曰夫

月之去也... 一... 想... 不... 速... 候...
 形... 幸... 山... 牛... 西... 履... 脉... 以... 一... 十... 一... 号... 以...
 德... 老... 杜... 某... 病... 幸... 事... 而... 死... 但... 脾... 胃... 经... 是... 于... 弱...
 形... 中... 矣... 亦... 反... 受... 不... 快... 望... 凡... 脾... 脾... 撞... 人... 目... 痒... 则...
 尤... 宜... 子... 乘... 者... 守... 不... 同... 也... 夫... 弟... 雅... 三... 省... 以... 症... 始... 事...
 主... 右... 他... 中... 字... 始... 与... 及... 以... 付... 一... 比... 中... 一... 步... 且... 未... 白... 本...
 美... 至... 年... 者... 有... 见... 報... 为... 附... 十... 五... 集... 卷... 林... 善... 与... 至...
 履... 夫... 寄... 乘... 者... 为... 乃... 者... 不... 知... 手... 摩... 字... 上... 下... 卷... 者...
 且... 何... 本... 也... 子... 均... 想... 时... 见... 兮... 无... 疑... 幸... 之... 未... 出... 矣...
 此... 别... 台... 之... 地... 事... 厨... 任... 中... 送... 附... 以... 口... 量... 体... 推... 自... 宜...
 了... 便... 宜... 一... 甚... 矣...

允夫州提印



朱熹 与允夫（程洵）尺牋
辽宁省博物馆藏

五朝名臣言行錄總目

第一卷

一之一

中書令韓國趙忠獻王

善

一之二

樞密使濟陽曹武惠王

彬

一之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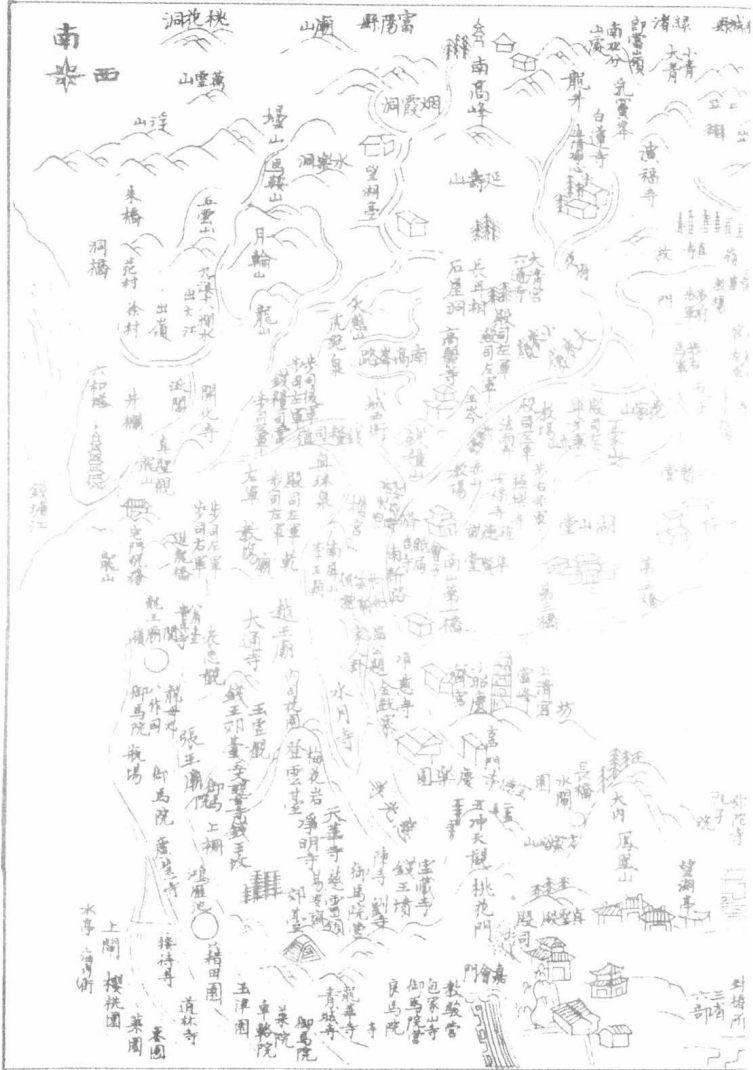
丞相魯國范公

質

一之四

內翰竇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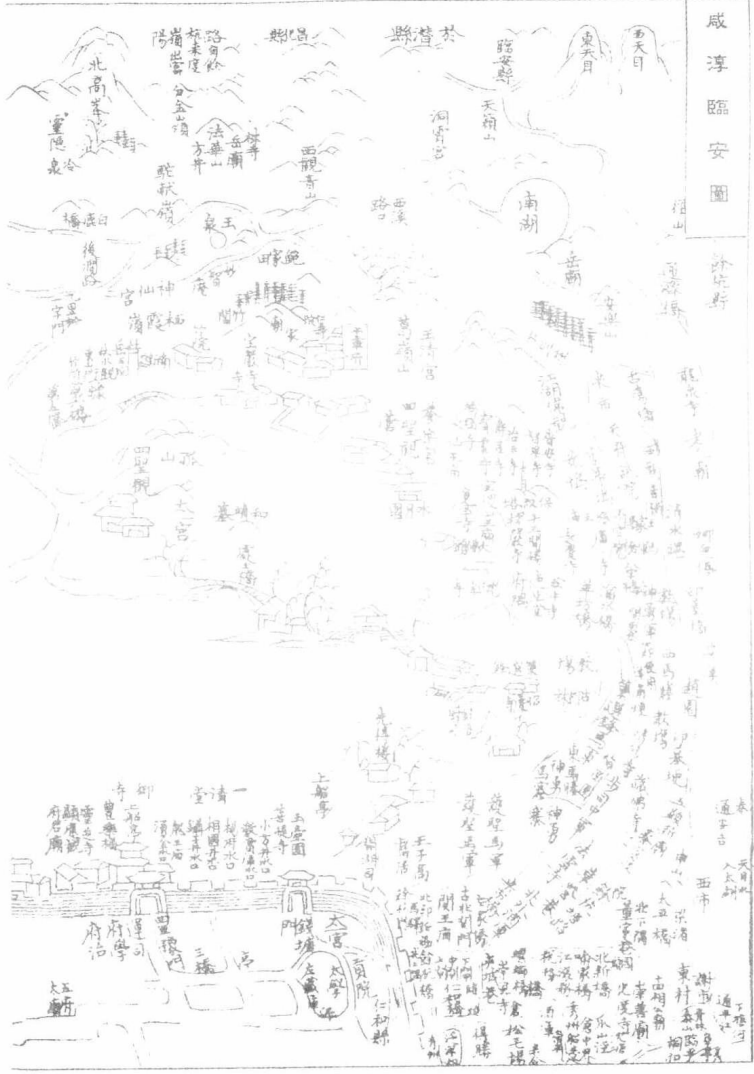
儀



咸淳臨安圖
引自《咸淳臨安志》

咸寧臨安圖

外經新



自序一

这部书是偶然写成的，从不在我的研究计划之中。1999年秋天，我开始为德富文教基金会的标点本《朱子文集》写一篇介绍性质的序文，史料中所引申出来的问题层出不穷，逼使我步步深入，终于改变了原来的写作方向。这便是本书的缘起。关于这一段经过，我在《朱子文集序》中已交代清楚了，今收入本书为《自序二》，以备参考。但《自序二》成于两年多之前，其时上篇仅成初稿，下篇则正在酝酿中，只能算是本书的一篇中程报告。现在全书完成，应该对撰述过程继续有所说明，这是《自序一》的任务。

本书是关于宋代文化史与政治史的综合研究，尤其注重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以研究的重心而论，文化史在儒学的复兴及其演进，政治史则在改革活动中所显现的权力结构与运作方式。但在实际的历史过程中，这两个系列的发展根本是交织在一起而不可能清楚分开的；二者统摄在士大夫的整体活动之中。宋代士阶层不但是文化主体，而且也是一定程度的政治主体，至少他们在政治上所表现的主动性超过了以前的汉、唐和后面的元、明、清。这是宋代在中国史上的一个非常显著的特色，过去的史学界对此也已或隐或显地有所察识。但是根据比

较严格的史学观点，我们不能仅仅满足于从直觉或整体印象所获得的抽象论断。怎样将这一论断建立在可以客观检证的历史事实之上，才是专业史学的本格任务。所以宋代士大夫的思维结构与行动模式在这部研究中占据了轴心的位置，本书副题主要即取义于此。

我在《自序二》中曾说，“原序（按：即指本书）共分八节，各有专题”，这是上世纪末的构想。当时的计划仍是每一节的论述都从宋初开始，到朱熹时代为止，合起来便可以大体呈现出“朱熹的历史世界”。在我写上面这句话时，第八节（初定为“理学与政治文化”）已草创逾半。2000年4月此节初稿完成时，已超过十万字，而且头绪纷繁，连我自己也不能卒读。很显然的，我的原有构想在复杂的史料面前已失去了统驭的力量，必须另起炉灶。此中最大的关键便是朱熹时代政治史上一个重要环节的发现。淳熙十四年（1187）十月高宗死后，孝宗曾部署了一次大规模的改革行动；在这一部署中他与当时理学派士大夫结成联盟，激起了持续十几年的政海波澜，著名的庆元党禁即其最后的结局。由于改革方案未及实行而政局已变，孝宗的最后部署和理学派士大夫的政治活动都没有在官方文书中留下明确的记录。这便是上面所说的历史环节。失去了这一环节，朱熹暮年为什么会遭党禁之厄便无从索解，而所谓庆元党禁也就变成一幕无意识的历史闹剧了。从南宋李心传的《道命录》、樵川樵叟的《庆元党禁》到清代全祖望的《庆元党案》（《宋元学案》卷九七）都不够解答这一无头公案。关于这一遗失的环节，下篇《绪说》中有进一层的说明，这里不再重复。

这一历史环节的发现使我不得不将第八节已成之稿当作初步收集的原料，而重新思考怎样建立一个不同的概念架构，以组织并解释因这一意外发现而引出的新史料。本书的下篇便是这样产生的。我决定深

人研究朱熹时代的历史世界，系统而全面地从直接史料中搜寻一切相关的证据，以重建 12 世纪最后二三十年的文化史与政治史，主题仍然是士大夫与政治文化的关系，但实际的重点则集中在理学派士大夫、官僚集团和皇权三者之间的互动。如果对上下篇加以区别，我可以说上篇为朱熹的历史世界提供了一个较广阔的背景，下篇则进入了朱熹所活跃的历史世界的核心地区。

上篇《绪说》长达十万言，而且自成一单元，也必须稍作解释。这一部分虽名为《绪说》，其实是全书完成以后的反思之作（相当于所谓“afterthought”）。去年年底下篇脱稿后，我重读上篇，颇感意犹未尽。本书既名为《朱熹的历史世界》，则道学（或理学），自应在其中占据比较显著的位置。我最初计划在旧稿第八节中正式讨论理学与政治文化之间的关系，但因研究的方向中途改变，下篇的重点转移了，竟没有足够的空间留给理学本身。所以反复考虑之后，我决定利用上篇《绪说》的园地，填补这一缺陷。因此我又从本书的特殊观点出发，全面探究了理学史上几个关键性的问题。《绪说》除第一节为解题而作外，其余四节都扣紧问题，尽其曲折，并在证据允许的条件下，力求推究到水落石出的地步。第二节以朱熹为中心，细辨“道统”、“道学”、“道体”等概念及其在理学史上的演变。只有通过概念辨析和历史追溯的交互运用，宋代道学（或理学）与“治道”的内在联系才能获得澄清。但是朱熹关于“道统”、“道学”、“道体”诸概念的理解基本上承自北宋的周、张、二程。为了更彻底地解决道学与“治道”的关系，我不能不回到北宋时期。所以第三、四、五节是我最后关于北宋道学的研究报告。在这三节中，我不但重新检讨了道学的起源与形成，而且也试图发掘道学的政治涵义。这篇《绪说》的主要结论和哲学史、思想史中的流行见解距离很大，但这是因视野不同而然，并非有心立异。我

所从事的仍然是历史重构的工作，尽可能地跟随着证据走。我自己并没有任何预设的哲学立场。

在本书撰写过程中，普林斯顿大学的两位同事，裴德生（Willard J. Peterson）和陆扬，常常很耐心地听我口述每一阶段的研究进展，并不断提出具有启发性的质难，减少了我在构思上的漏洞。台北友人黄进兴从头到尾读过全稿，他的批评和建议更使本书内容得到具体的改进。亚利桑那州立大学（Arizona State University）的田浩（Hoyt C. Tillman）是南宋儒学史的专家，我也曾一再向他请教，因此对于最近的研究动态才不致过分隔膜。对于以上四位友人，我要特别在这里表示由衷的感谢。允晨的执行编辑杨家兴先生最有耐心，容忍我不断修改书稿，屡误出版的期限，除了谢意之外我还应加上歉意。最后我感谢德富基金会的支持，使我在教学期间获得较多的自由时间，从事研究和撰述。否则本书的完成更不知将延迟到何时了。

余英时

2002年7月25日

自序二

“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在我开始写这篇序文时，孟子这句名言是我的惟一指导原则。这部《朱子文集》是根据现存最好的几种版本，精心校刊标点而成的。为这样一部重要的经典写序，我不敢不敬慎从事。

为了写好这篇序文，我首先从“知人论世”的观点重读了全部《文集》和《语类》。由于王懋竑《朱子年谱》以考证详实，取材广博著称，我也就大关键处对它反复推究过好几遍。在我最初的设想中，经过这样的准备，我便可以心安理得地写一篇不致误导《文集》读者的序言了。

我的理想中的“知人论世”既不是给朱熹（1130—1200）写一篇传略，也不是撮述其学术思想的要旨，更不是以现代人的偏见去评论其言行。我所向往的是尽量根据最可信的证据以重构朱熹的历史世界，使读者置身其间，仿佛若见其人在发表种种议论，进行种种活动。由于读者既已与朱熹处于同一世界之中，则对于他的种种议论和活动便不至于感到完全陌生。不用说，这只能是一种高悬的理想。事实上，即使没有后现代史学的挑战，我们也早就知道历史世界已一去不返，没有

人具此起死回生的神力了。然而不可否认的，一直到目前为止，这一重构的理想仍然诱惑着绝大多数的专业史学家，甚至可以说，这是他（她）们毕生在浩如烟海的史料中辛勤爬搜的一个最基本的动力。史学家诚然不可能重建客观的历史世界，但理论上的不可能并不能阻止他（她）们在实践中去作重建的尝试。这种尝试建立在一个清醒的认识之上：历史世界的遗迹残存在传世的史料之中，史学家通过以往行之有效和目前尚在发展中的种种研究程序，大致可以勾画出历史世界的图像于依稀仿佛之间。同一历史世界对于背景和时代不同的史学家必然会呈现出互异的图像，因此没有任何一个图像可以成为最后的定本。

但历史世界的图像毕竟不能与文学或艺术上的虚构完全等量齐观，因为它受到历史证据的内在制约。否则不仅不同图像之间将失去评判的共同标准，而且我们也没有任何根据可以不断修改史学界目前接受的一切图像了。

在这一认识下，我开始撰写《朱熹的历史世界》作为《文集》的引言。但我刚一动笔，便立刻发现自己的准备工作远远不足。首先，朱熹的历史世界究竟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其次，这个世界究竟应该包括哪些内容？这两个基本问题都是朱熹的《语类》和《文集》本身所提出的，并非我无中生有，强加于原始资料之上。朱熹曾说：“国初人便已崇礼义，尊经术，欲复二帝三代，已自胜如唐人，但说未透在。直至二程出，此理始说得透。”（《语类》卷一二九）这样看来，他的历史世界的上限便非追溯到宋初不可了。再就第二问题言，在《文集》《书》一项中，卷二四至二九特标“时事出处”之目，卷三十至六四则归入“问答”一类；前者属于政治文献，后者则是论学信札。《文集》编自何人虽不可详考，但今天流传的《文集》本在朱熹死后数十年内已大致编

定，则可断言。可见朱熹的后人和弟子都认识到政治和学术是他的世界中两个主要方面。纯以数量言，“问答”类信札自远多于“时事出处”类。但“问答”类中仍有不少涉及“时事出处”的讨论。如果再加上卷十一至二三的《封事》、《奏劄》、《奏状》、《辞免》之类的大量文件，则政治和学术在《文集》中的比重几乎不相上下。

我最初的构想是在时间上以南宋为限，在内容上专重学术。现在《文集》、《语类》的内在脉络逼使我不得不修改原有的计划。这样一来，我的准备不足便十分显然了。几经考虑之后，我最后决定以士大夫的政治文化作为全文的主题。朱熹代表了宋代士大夫中的一个典型，他的《文集》内容十分丰富，也充分反映了当时士大夫生活的多面性。士大夫构成了他生活世界中的主体，这是不言而喻的。但是我为什么把重点放在“政治文化”上面呢？这是因为我要兼顾《文集》中政治和学术的两个主要方面。事实上，政与学兼收并蓄不仅朱熹为然，两宋士大夫几无不如是。政治文化是一个富于弹性的概念，既包括了政治，也涵盖了学术，更点出了二者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不但如此，这一概念有超个人的涵义，可以笼罩士大夫群体所显现的时代风格。所以我采用“论宋代士大夫的政治文化”为序文的副题。

但这样一来，我的序文便像脱了缰的野马一样，往来奔驰于两宋政治史与文化史两大领域之间，欲罢不能。这匹野马每转一个方向，我这个马夫便要先做好开辟道路和储蓄草料的准备。其结果是马既不能疾走，马夫也疲于奔命。大概“人仰马翻”这句成语最能形容这篇序文撰写的过程。现在序文虽已接近尾声，但由于明显的理由，却无法出现在《文集》的前面了。为了履行早已承诺的任务，我不得不另起炉灶，循着已成序文（以下概称“原序”）所提供的线索，重写一篇新序。原序共分八节，各有专题；新序则取发展的观点，对朱熹的历史世

界作整体的动态观察。原序与新序之间的异同大致如此。但限于篇幅，新序不能详著立论的根据，这是要请读者原谅的。

概括言之，在朱熹的历史世界中，士大夫的政治文化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的高潮出现在仁宗之世，可称之为建立期。所谓建立期是指宋初的儒学复兴经过七八十年的酝酿，终于找到了明确的方向。在重建政治、社会秩序方面，仁宗朝的儒学领袖人物都主张超越汉、唐，回到“三代”的理想。这一理想也获得皇帝的正式承认，所以南宋的史浩向孝宗说：“本朝之治，与三代同风”是仁宗以来“祖宗之家法”。（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三）在士大夫作为政治主体的共同意识方面，范仲淹所倡导的士大夫当“以天下为己任”的呼声则获得了普遍而热烈的回响。第二阶段的结晶是熙宁变法，可称之为定型期。这是回向“三代”的运动从“坐而言”转入“起而行”的阶段，是士大夫作为政治主体在权力世界正式发挥功能的时期。在神宗与王安石之间，这时出现了一个共同原则：皇帝必须与士大夫“共定国是”。这是北宋政治史上一项具有突破性的大原则，王安石因此才毅然接受了变法的大任。也正是在这一原则之下，王安石才可以说：士之“道隆而德骏者，虽天子北面而向焉，而与之迭为宾主”；文彦博才可以当面向神宗说：“为与士大夫治天下”；程颐才可以道出“天下治乱系宰相”那句名言。尽管以权力结构言，治天下的权源仍握在皇帝的手上，但至少在理论上，治权的方向（“国是”）已由皇帝与士大夫共同决定，治权的行使更完全划归以宰相为首的士大夫执政集团了。

第三阶段即朱熹的时代，可称之为转型期。所谓转型是指士大夫的政治文化在熙宁时期所呈现的基本型范开始发生变异，但并未脱离原型的范围。王安石变法是一次彻底失败的政治实验——这是南宋士大夫的共识。但这场实验的效应，包括正面的和负面的，都继续在南